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22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①

林岗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关键词:秦征南越;线路;《淮南子》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121-09

On the Routes and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Military Expedition on the Nanyue Kingdom Mounted by the Qin Dynasty

LIN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Liu Che in the Han Dynasty, he mounted a military expedition on the Nanyue Kingdom. It was recorded b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three main troops were sent to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by pass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Five Ridges. In light of the actual combat experience,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for the Qin Dynasty, when mounting a military expedition on the Nanyue Kingdom, to have sent five troops to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s it described in the book *Huainan Tzu*. The historian LV Simian has pointed out this absurdity in *Huainan Tzu*. Based on the geography, the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arch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possible expedition routes, this paper rectifies the outdated doctrines of *Huainan Tzu*, and reexamines the routes and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military expedition on the Nanyue Kingdom mounted by the Qin Dynasty.

Key words: the Qin Dynasty mounted a military expedition on the Nanyue Kingdom; route; *Huainan Tzu*

秦并六国之后岭南并没有随即纳入秦的疆域范围。秦的南方疆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岭南地带,秦汉文献称这一地方为“北户”,约略相当于今两广地域。一条大致东西走向的五岭山脉分隔了岭南与岭北的势力范围。但是崇山峻岭的区隔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地域在秦征南越之前没有交通、商贸或朝贡觐见的关系。《太平御览》就曾引《尚书大传》所讲西周初年越裳重译而献白雉的故事^②,汉魏骚人的诗赋将此引以为典故美谈。《逸周书·王会解》记汤命臣伊尹令四方之臣属百蛮进献宝物,南方的百蛮为“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宝物是“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当然那时“南”的概念并非仅指岭南,但岭南亦包含在内。出土的古器物也佐证远古时代的岭外交往。信宜县曾经出土过一件西周铜盃^③,而春秋之世,“南夷”、“苍吾”、“南瓠”、“南国”等表示百越民族的铭

① 收稿日期:2014-08-16

作者简介:林岗(1957-),男,广东潮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② 见《太平御览》785卷。

③ 徐恒彬:《广东信宜出土的西周铜盃》,刊《文物》1975年11期。

文就频见于中原的青铜器上”^{[1]9}。越人古称百越,本来就生活于长江流域及岭南,他们断发文身,与中原礼俗不同,但亦世代交往。华夏势力南渐,越人不是汇入中原的洪流就是避地南迁。虽然岭南岭北据五岭而以为屏障,但文化、贾贩和朝贡的交往,地理障碍是挡不住的。自古以来有五岭交通的说法,而五岭并无大的歧义,从东到西依次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春秋战国之世,当有崎岖蜿蜒的小路穿行在山谷之中,文化和贾贩的往来就借山道而进行,联系着这两个地域的交流。

不过军事征战意义上的交通与文化、商贸意义的交通不同,征战牵涉到大量物资和人员的转移调度,而文化、商贸行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两者所依赖的通道要求并不一样。秦征南越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找到可供转运大量人员和物资的咽喉要道。现成的五岭关隘并不是每一个都符合这一要求的。在这个问题上,地理、水文因素至关重要。假如我们不能从征战方略的角度思考这一点,一则不能理解秦人当年的苦心孤诣,二则容易被相互矛盾的文献记载所困扰,所以有给予讨论的必要。

先按下秦人南征线路分析不表,首先看看百年后武帝时期征南越国的进军线路。因为后者文献相对丰富而且可靠,以此作为分析秦征南越进军方略的背景,有助于理解秦人对进军路线的选择。秦开南海、桂林、象郡4年而秦始皇死,中原大乱,赵佗乘机割据称王。其后臣汉,然而依违两间。至前112年南越国举兵叛乱,图谋立国。《史记·南越列传》云: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①

四路远征军之中,前三路当是主力。“巴蜀罪人”和“夜郎兵”只是补充。四路都要乘船浮江而下。驰义侯所率的那一路沿西江向东而来,其余三路都是自北向南,度越岭南山脉,再寻找合适的地点造船浮江而下。而这正是领兵主将的封号皆从“水”或从“船”的原因。从进军的角度看,三路主力也一定是循水路到达岭北行船极限的某个地点,舍舟登岸,然后再翻山越岭的。之所以要尽量沿水路进军,一来因为中国东南地区皆是崇山峻岭和丘陵,陆路艰阻,不胜其苦。二来因为水路快速便捷,更兼都城要地均是依江河而建,水路进军直抵其心脏。“咸会番禺”就是这个意思。三来因为粮草辎重水运远胜于陆输。

司马迁这段记载提供了大致的大军进发起点和到达地点,虽然范围较大亦能略知,极大方便了我们据地理状况清楚勾勒三路远征军由岭北到岭南的线路。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今广东连州县汉时称桂阳县,汇水当是湟水^②,也就是由今连州流经阳山的小北江。小北江在今英德市南20公里处的连江口镇汇入北江,沿北江而下,直抵南越国都即今广州市。汉设桂阳郡,郡治在今郴州,古称郴县。如果伏波将军出兵时已经占据了连州,那么就是兵发连州^③。如果其时连州尚在南越国据守之中,那路博德“出桂阳”就是从彬县到连州依陆路而行。由连州经山塘就到达湖南临武县,连州山塘镇现已归并到大路边镇。山塘在顺头岭上,至今犹存当地人称的“秦汉古道”,古道全长约1.5公里。由山下拾级而上至登顶处有乾隆年重修的“南天门”。“南天门”内是一处古旧建筑,很明显是古时驿站。山塘古街依稀可见青石铺路,临街建筑是客店和高铺模样。此处古官道遗址是自古以来扼守岭南岭北交通要道的见证当无可疑。山塘正北行20公里即是临武县城,临武再北行80公里便是郴州,从汉桂阳郡治下的彬县即今永兴县,就可下船沿耒水到秦汉时期南方的政治中心长沙。“出桂阳,下汇水”的伏波将军当年

① 征南越国线路的记载,《汉书·武帝纪》稍详。班固在“离水”之后增一句,“甲为下瀨将军,下苍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此理解为不同的两路。(见杨杰《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第2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但似乎顺漓江南下,分兵一路攻占苍梧,一路继续东进番禺,更加合理。

② 《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湟’。”《汉书·地理志》:“桂阳,汇水南至四会入郁,过郡二,行九百里。”《索隐》引刘氏云:“汇当作‘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下湟水”,可证。小北江河段阳山以上,至今犹称湟川或湟水。

③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史记》下文既说“道远”,耽误了行期,那从这最接近之地下水,无可能会耽误行期。伏波将军由桂阳郡发兵似更接近事实。

似行此道到岭南。

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的路线相对简单。由江西大余北流在赣州汇入赣江的赣江上游支流汉时称豫章水。“横浦”既曰下,当在河流近旁^①。如从横浦浮江,沿湓水至今韶关汇入北江航道,乘江而下,也是直抵南越国都。但从大余到始兴也是陆路,无舟可依,全程也有约80公里。忆当年寻访梅关古道,沿今G323国道行驶,过了南雄,坡度陡然增加,一路上坡50余公里,直到拐入大庾岭谷,弃车徒步登山,梅关古道石坡道旁,苍梅点点,石阶落脚处,明显凹下,显出脚印形状。这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由此闯关过隘而留下的痕迹。待登上梅关至顶处,可远眺大余县城。当年楼船将军也是沿大概线路翻山越岭,来到地势较平稳处的“横浦”,安营扎寨造船,然后出击的。至于戈船、下厉将军的路线,完全重复了百年前秦人征南越的路线。

由百年后汉人征南越国一事,可知有三条通道可供征伐进军之用。当然这只是西汉的情形,是不是西汉上溯一百余年秦始皇野心勃勃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呢?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问号。在这个似乎没有提出疑问余地之处将它作为疑问提出来,我以为是有利于理解22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征战的。正史没有任何文字提到秦人多路进军,这三条南北通道中的两条也没有留下秦人大军过后的痕迹。当然也没有办法排除年代久远,遗痕已经湮灭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可以比较三条线路的便捷性和险阻程度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判断。

不计陆路,出桂阳下湓水一线是水路最短的。它不但利于进攻,而且依傍湘江流域洞庭湖周边的区域经济富庶之地,物资增援更加便捷。如果不是陆行遥远,那便是上佳的选择。出豫章下横浦的线路也是如此,水路虽然远些,但顺流而下,水行不是问题。陆路的部分比穿行骑田岭与九嶷群山之间的丘陵要便捷些,但也有不短的距离。司马迁讲到西汉征南越国,元鼎五年秋发兵,经过一年多备战。这当包括翻越关隘,打造舟师,于元鼎六年冬进兵。“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峡,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②两军约定攻击,而楼船先至,此处所谓“道远”,当指陆路部分带来的不便。从水路而言,伏波所行,实在不能说是道远。由此可以推测,陆路部分的远近,其实是大军进发时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汉人所以虽有如此之长的陆路阻隔,仍然敢于选之为进军路线,是由于秦汉鼎革,汉世承平将近百年,特别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大增。民间富裕,民夫征调也比较好解决,故三军并发,企求迅速平定内乱。

秦并六国之后,百姓未有休养生息,仅隔数年便南北同时用兵,北逐匈奴,南取南越。虽然穷兵黩武,但有没有西汉的实力,这显然是有疑问的。从已知的秦人进军线路,千方百计避开陆路,宁可花数年时间开凿灵渠工程,使得粮草运输可以完全依赖水路。从这一点推断,秦征南越,由湘江而漓水,这很可能就是唯一的进军线路。以西汉征南越国作为背景来思考推断秦人进军南越的方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这就是两者性质的区别。汉征南越国是平息叛乱,而秦征南越是武装拓殖,开疆拓土。南越国主对内称王,对外臣属于汉。因不甘心内附而离心离德,最后揭竿自立。以当时的政治伦理衡格,就是诸侯叛乱。自从赵佗治国,南越的汉化程度自然加速,又经将近百年,虽然人心未必皆思汉,但只要不是越族中坚,亦当无人恋战。汉兵发四路,两路未至而事件已经平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③此中岂非透露出人心向背的信息?秦汉虽两征岭南,而汉征南越国用兵的指向是南越国的政权及其统治集团。上层底定,下层不是问题。但秦征南越就不是这样了。对秦而言,南越荒服,化外之地。秦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成熟的内部统一的政权,而是一个不相统属的越人生活的广阔地带。部族的而非成熟国家的政权盘踞在岭南各地。虽然具体的地点文献完全无证,但秦人开郡立县之地和其后南越国活跃的管治地多是承继越人部族政权盘踞之地。这些地点分布地域广大,秦人要武力开边,一定要将未必很强大但却持续的反抗纳入考虑。因为其时百越民族对秦代表的中

① 横浦关在何处,众说纷纭。本人以为梁国昭、廖晋雄说汉横浦关在今始兴县境内湓水旁为近是。详见 <http://news.163.com/07/1211/12/3VEBEMGV000120GU.html>。

② 见《史记·南越列传》。

③ 《史记·南越列传》。

原文化的认同度不能估计过高,一种不可抗拒但不受欢迎的政治因素借武力介入百越人已有的生活,这会引发持续的反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汉虽两征南越,但难易程度因其性质不同是有差别的,秦难而汉易。逆难而上,站在秦人的立场,可以使人力和物资持续不间断地输入新开之地以便弹压反抗,这当然成为南征方略的考量要素。要对付这顽强的抵抗,可能的选择是开辟和维持与政权腹地的运输和交通命脉。这不是一般的民间贾贩往来路线,而是可供大规模运输的线路。由这种观点看,尽管其他两条可能的线路——“出桂阳,下湟水”和“出豫章,下横浦”——还有待于考古发现来证实,尚不能完全排除它曾经存在的可能性,但其地理的险阻和不便相比之下,一目了然。基于此,本文对非正史的说法持审慎怀疑的态度,与其不加思考而盲从,不如将视点转移至另一条确凿无疑的秦征南越线路——出零陵,下离水。如果理解了这条线路的地理政治含义,秦人征伐的线路就会更清晰显露出来。

二

与桂阳线 and 豫章线相比,零陵线的地理险阻是最小的。秦长沙郡设九县,零陵是其中之一,县治在今比邻广西的全州县西南^①。在今全州县城湘江与它的一条上游支流灌阳河汇流,谭其骧考证战国出土青铜器鄂君启节,以为战国时湘江航运路线就通到今全州。由全州至兴安是一个狭长如走廊的地带,今人称“湘桂走廊”。由平原和局部丘陵组成,没有高山险阻,纵距约90千米,宽距约20千米。更特别的地方是走廊的东西侧,各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走廊的西侧是猫儿山,山脉绵延至资源、龙胜等地。它的最高峰海拔2141米,是广西境内的最高峰。犹记当年友人带我上猫儿山,车入山爬行两小时才至主峰近地,一大片高山沼泽,古木青苔,郁郁葱葱,终年烟雾缭绕,湿度极大。此古木沼泽之地,学名称为“森林泥炭地”。由于千年树木落叶腐烂堆积,因低温细菌不活跃而难以分解,形成约两米厚的泥炭层,古木长于其上。此种地貌亦为我初见,据闻泥炭层含水约60%,沼泽密林之中见一块“三江源”立碑,表明资江、漓江、浔江都发源于此地。猫儿山东面的丛岭称为越城岭,界邻湘桂走廊的西侧。横越过湘桂走廊的平原丘陵,就到了东侧的海阳山。海阳山也是一极大的山脉,东向绵延至灌阳县,它的最高峰也有海拔1936米。海阳山里的山溪流水发育成河流入兴安县境内的湘桂走廊,被称为海阳河,北向而流,海阳河是湘江的最上游。而猫儿山里的山溪流水发育成河,称为大榕江,是漓江的上游,同样流入湘桂走廊,只不过它向南而去。两河可供通航之用的最短距离,依灵渠的走向,是30千米。

对古人征战而言,零陵线的地貌和水文状况提供了其他线路无法可比的优胜之处。首先是陆路的便利性。湘桂走廊中虽有一些丘陵,但几乎都是平路通行,没有险峻的山路。像豫章线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长度虽只有大约2千米,但坡度却有30°至40°,人行若是负重,就不胜其苦。桂阳线的顺头岭没有梅关古道那样陡峭,但拾级而上也是相当吃力。其次是湘桂走廊具备通航的潜在可能性,当然所谓通航的潜在可能性是依社会发展程度而转移的。而湘桂走廊之内,大榕江和海阳河相去不远,古人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两河的高差又在古人的技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兴建工程,则河流的自然赐予便可以利用。这里不能不提的是此地的自然环境的特别之处。如此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能够形成两条水量丰富的河流“擦肩而过”,真是中国之内独此一处。原因在于走廊两侧绵延的群山,盖高山是河流水源发育的必备条件,而走廊两侧又皆是绵延数十数百公里的群山,而造化又让它们汇流于同一地域而方向相反。自然的赐予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然赐予,秦人的南征则不知如何措手足。人类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亦必须仰赖自然条件的赐予才能展开这样一个道理,在此处便得到一个生动的案例。

战国时代便有船通航至全州(即古零陵县)^②,这说明这里早就存在一条往来频繁的商贸通道。根据鄂君启节,船又分为“舫”与“舟”,舫大而舟小。如舫航行至零陵某处,舫换为舟,摇橹或撑杆则可以通至更上游而接近兴安。《史记·货殖列传》云:“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司马迁的年代,比起秦及战国又过了百年以上。

① 有地方史学者以为县治在今全州县西南39公里处的咸水乡。<http://bbs.rednet.cn/thread-24124141-1-1.html>。

② 曾昭璇将鄂君启节中“内入湘,庚贴,庚邗阳”的文字译为“行驶入湘江,经贴(地名),经全州(即邗阳)”。此解亦可为谭其骧的说法佐证。见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族》,第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秦征南越之后百余年,番禺可称为一都会而比肩中原富庶之地,一定有它原来的物资基础。这当然是得益于珠三角冲积平原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原的诸侯贵族又都好玩四方珍奇宝物,而四方远服进献所产宝物已经是一个悠久的中心同周边势力交往的惯例,它既有经济的含义,又兼有政治的含义。司马迁提到的五种特产,有三种即珠玑、犀、玳瑁与《逸周书》提到的重复,或许说明那时中原有求于岭南的,大概是这些无关百姓日用的珍稀玩物。那么岭南越人有求于岭北中原的又是什么呢?南越国与西汉交恶的缘由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线索。班固讲述南越国史的时候比司马迁详细,其中谈到南越国与西汉交恶的原因。原来秦亡后赵佗统领岭南三郡,仅“自立为南粤武王”^①,然而“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②。赵佗向汉文帝派来的使臣陆贾抱怨说:“孝惠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甚厚。高后自麟用事,近细士,用馋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牡。’”^③西汉的禁运政策触怒赵佗,故他“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④。岭南冶铁技术落后于中原,而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军事自卫,都要大量铁器才能满足需要,这是岭南有求于中原的。不独西汉时代如此,秦和战国时代亦当别无两样。高后盲目禁绝关市贸易的政策,触发了地域的对峙。不过由此可知岭南和中原的贸易状况大致就是这样,中原需要珍稀宝货,岭南需要铁器,包括铁制农具和武器。曾昭璇探究岭南史地时也讲到岭南战国时代的墓葬屡有发现楚铜兵器,肇庆、四会、清远都有同样的发现,广州地区出土的秦墓也曾发现楚式龙纹铜镜^⑤。总之,岭南岭北两地商贾贸易一直是存在的,在诸条贸易通道之中,零陵线最为便利,阻隔最小。文献提到这条商道也相对多些,这也证明这条通道应用广泛。岭北的铁器经船运至湘江最上游,然后经过短途陆路,再转至漓江上游船运,就可以抵达岭南各地。相比桂阳线和豫章线,零陵线陆路转运的距离最短,最为便捷。

秦人南征在这个既成的商贸通道基础上,权衡利害取舍,在此地措置运河和灵渠工程,将之作为南征的基地,这也是顺理成章,合乎理性考量的选择。

三

秦征南越到底循何路线进军南下,正史并无任何现成答案。最流行的说法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犂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

这段话包含了对秦征南越原因幼稚的判断、发卒数目的虚夸之词和史实的混乱,但为历来探讨秦征南越必引的文献,由此而产生了几乎固定的成说。以本人所知,除历史学家吕思勉对这段话提出根本性怀疑之外,再也没有人给予辨证。吕思勉的读史札记《秦营南方》上下篇曾于1937年刊载《燕石札记》,可惜不为治南越史地者重视。有感于陈说陈陈相因,特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作一番补充订正。

秦征南越为了犀角象齿这些珍稀宝货,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犀角象齿之属,中原虽罕有,但也可以通过朝贡贸易获取。中原所需要的宝物一直都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文献也不是没有记载,何以到了秦人就非得兴兵征伐获此区区之物。当然,汉人秦亡过后,痛定思痛,将秦的根本教训归结为放肆贪婪,这也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历史道德化,未免不得要领。正如吕思勉说的,“汉人轻事重言,述古事多不审谛,未可概据为信史也。”^{[2]13}

发卒五十万一事另文再论。分为五军,镇守五处,这个说法不禁引发疑窦。先说“余干之水”。余干秦代属九江郡治下的县,县治与今江西余干县同,在南昌之东,鄱阳湖之南。发源于玉山县的余水西流经上饶、鹰潭再西北向流经余干入鄱阳湖。余干确是一个战略要地,但这个地方既无水路也无陆路通

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族》,第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不过,曾氏将此类出土实物当作南越臣属于楚的证据,这恐怕推论过度。

到南越,况且距离甚远。若谓戍守军队对付南越,真不知怎样才能说得通。如果说是对付闽中郡的东越,地理上说得过去。但据谭其骧的考证,闽中郡之设,比南越三郡早8年^①。待到要征南越时,闽中东越早已在图版之内,何需劳动大军戍守防备呢?《史记·东越列传》讲到,闽越王无诸和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人,“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所谓“废为君长”,是秦并六国之时,大军势如破竹,原来盘踞福建和浙江南部称王的“闽越王”和“东海王”,归附秦朝,秦亦免去征讨,就以他们为治理地方的“君长”。大概如同唐代羁縻州的土酋,秦不派流官,土酋也心向朝廷。闽中郡的“君长”,直到秦亡,并无举兵叛乱的记载。发卒戍守“余干之水”,实在无此道理。戍守“余干之水”的说法,与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严重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漏洞。或许是淮南的编撰者将南越和东越混为一谈。其次是“番禺之都”。番禺是秦时南越最发达之地,其经济军事力量也最强。这从后来赵佗割据称王,统一南海、桂林、象郡,设都城于番禺(今广州),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是有秦军戍守,那当然是已经攻占该地了。既然已经攻占了最要害之地,那千辛万苦都是为了通往番禺的“九嶷之塞”和“南野之界”,何苦还要派大军镇守呢?镇守“九嶷之塞”、“南野之界”与“番禺之都”之间,是自相矛盾的,其牵强附会的漏洞,显而易见。

更须探讨清楚的是,按当时实际情形秦与南越的五岭边地,到底有否戍守的必要?《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和主要门客编撰的书,但就是这个淮南王刘安的另一说法,提供了我们窥探五岭边地戍守问题的线索。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闽越兴兵攻打南越,武帝遣将军将兵诛闽越而淮南王刘安上谏书,其中讲到岭南岭北地形不同和戍守之事。《汉书·严助传》有刘安的谏书云:“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入中国必先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讲的虽是闽越,但用之南越,亦无不合,更何况是将近百年之前,情形更是如此。百越人如果真的要逾岭北攻,也一样要先度越五岭,下到水流不太湍急的地方,伐树造舟,顺流而下,才能进兵。如果发现有越人逾岭而来,只要及时“收捕”和“焚其积聚”就可以了,焉用大兵把守?淮南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而又在《淮南子》中倡五岭之戍,岂非又自相矛盾?正如吕思勉评论《淮南子》这段话时说的:“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当时用兵南越,天时地利,皆非所宜,偏师丧败,事所可有,然以大体言之,则三郡之开,辟地万里,越人固未尝敢以一矢相加遗,安用局促守五岭乎?使一败而至于据岭以守,则三郡之不属秦久矣,何以陈胜既起,任嚣犹能擎南海以授赵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犹多秦吏,而待赵佗稍以法诛之邪?(见佗本传)《陈馥传》(《汉书》——引者注)载武臣等说诸县豪杰之辞,谓秦南有五岭之戍。盖汉通南越,岭道有五,故为此辞者云尔,非必武臣当时,语本如此。”秦人攻占岭南后,遣戍开边,实行屯田,这是有的。然而要说戍守五岭,此说十分可疑。吕思勉数十年前已经指出《淮南子》说法的漏洞,值得我们深思。

更不可思议的是,《淮南子》“分五军”守五岭的说法,到了法人鄂卢梭(L. Aurousean)那里衍生成秦分五路大军平南越和征战分两个阶段之说。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由冯承钧翻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持说甚为疏漏^②,不过至今尚是唯一论述此事的专题著作,谬见流传,影响甚广,实有驳正的必要。后世治岭南史地和古代军事史者,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出鄂卢梭的影子。恐怕由于五岭也意味着五条古代南北交通的路线,既“分五军”戍五岭,而秦又确是吞南越而开三郡,于是就衍生出五路进军的臆想之词。鄂卢梭考证了五岭位置之后,断言秦兵分五路进军:

第一军从赴桂林(广西)的一岭进兵。……第二军过第四岭,而入广西的东北境。……第三军逾第二岭。(长沙至番禺一道)好像无任何困难达到番禺。第四军取南昌赴番禺一道。而逾第一岭,进入广东,占领广东东北部。至若第五军,我们从他文知道他已到福建,而在221年

① 谭其骧同意王国维的说法,认为闽中郡设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见《长水集》上册,第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已经指出鄂卢梭的若干错误。见《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

设置闽中郡。^{[3]45-46}

鄂卢梭的第一军对应于“塞罽城之岭”，第二军对应“守九嶷之塞”，第三军对应“处番禺之都”，第四军对应“守南野之界”，第五军对应“结余干之水”。数字是能够对应起来的，但五岭的地望与“五军”所处之地并不能一一对应，鄂卢梭只好曲为之说，随机应变而乱说一通。五岭之一萌渚岭，被鄂氏称为第四岭，但《淮南子》并无提到萌渚岭，于是鄂氏就将“守九嶷之塞”的第二军“拨归”萌渚岭而“入广西的东北境”。既然“守九嶷之塞”的去了第二军，那第三军“处番禺之都”就无岭可以托付而只能“从天而降”番禺，鄂氏的说法是“从长沙至番禺”。《淮南子》只说“处番禺之都”，并没有说进军，鄂氏附会成进军，就只好笼统说秦兵由长沙至番禺了。“结余干之水”与五岭无关，然而五路大军总要进发，由余干进发去哪儿呢？总不能说进发到南越来吧。鄂氏只好将这第五军说成是进入福建，征讨东越。但秦无征东越之事，当然是鄂卢梭自己信口开河了。

自从鄂卢梭臆想《淮南子》“分五军”戍守而为分五军进发征南越后，风从者不少。如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引用过《淮南子》那段话之后：

上述五军，实际上就是从五个方向向岭南进发或驻守：“塞罽城之岭”的秦军驻守于今广西的罽城之岭（即今广西北部的越城岭）；“守九嶷之塞”（即今湖南宁远县南）；“守南野之界”的秦军则扼守南野（即今江西南康县南部）；“结余干之水”的秦军则驻守于余干（今江西余干、乐平县之地）；“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则从湖南出发，通过九嶷要塞，过岭顺北江而下达珠江三角洲，并占领了番禺，以这支秦军最为神速^{[1]26}。

此说完全承继鄂卢梭而来，甚至语气亦都相似，只在地望的标识上略为清楚了一些。徐俊鸣也持相同的见解：

秦始皇33年（前214年）平南越，曾分军五路，其中“守南野之界”的一军，就是经江西南野（今江西南康县境），越过大庾岭，再沿湓水而下。^①

胡守为《岭南古史》虽然认为鄂卢梭的看法可商榷，但亦视为聊备一说：

秦军进攻岭南共分五路，据法国学者鄂卢梭分析：一路从靖州入广西桂林；一路从湖南宁远，越萌渚岭，入广西贺州；一路从湖南长沙经郴州，越骑田岭至连州，入广东达番禺；一路从江西南昌，经南康，越大庾岭，入广东南雄；一路从江西余干入福建，先征服闽瓯，再转向西，经潮安越揭阳岭，与其他军会合。其说是否准确，固可进一步讨论，但已提供了秦军入岭南较明确的线索。^{[4]27}

《淮南子》用词“塞”、“守”、“处”、“结”都是戍守的意思，非指进军。鄂卢梭推衍为五路进军，如果不是不能正确理解文辞的含义，就是包含了“过度解释”。依傍这种建立在臆想基础上的“过度解释”，秦征南越的事实不是变得“较明确”，而是变得更离奇。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讲到秦征南越作战方略时，也顺势推衍为五路进军之说：

秦始皇对此散布于广大地域之百越蛮族，其作战方略系取分途进军，略定各地。其有抵抗者，则联络各路军合击之。依淮南子人间训篇所载，秦军向岭南及闽中进军系分五路，概略如下：第一路，由鄱阳湖东侧经余干进入闽中，略定闽地。第二路，由鄱阳湖西侧经豫章南康进入粤北，与第三路连系略定番禺地。第三路，由长沙宜章进入粤北，与第二路第四路连系略定番禺地。第四路，集结于零陵蓝山，以策应第三路与第五路之作战。第五路，由黔中罽城（今湖南黔阳县）之道进入桂林，略定桂林地。^②

这段讲述的佳处是颇有军事家的风格，但所谓“分途进军”，即使不是得自鄂卢梭，也是附会《淮南子》的说法。直到鄂卢梭无师自通而创为分五路进军之说以前，历史文献从无这样的说法。前人只说“戍”，而无说“进军”者。有之，是从鄂卢梭开始。我们知道，戍五岭是淮南的说法，前人也有接受淮南

① 徐俊鸣《韶关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载《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139页。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年版。

②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第594页。此著集体编著，为非卖品，初版于1963年（署民国五十二年，由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印）

说法的。但从无人将“戍五岭”解成“发五军”。东晋徐广就接受淮南戍五岭的看法,他的用词是“守五岭”,被刘宋裴驷引在《史记集解》里面。司马光是这样处理正史和淮南关系的: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①

司马光未有讲“发五军”,而是讲“戍五岭”,而此事是既已占地、分郡之后发生的。既然已占地分郡,“发军”则无从谈起。由吴士连修撰于十五世纪末的越南历史文献《大越史记全书》讲到这一段时,也如司马光的理解一致:

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发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置桂林(今广西明贵县是也)、南海(即今广东)、象郡(即安南),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龙川,南海属县),领谪徙兵五十万人戍五岭。^②

越南的第一部国史,编撰于13世纪的《大越史记》也是这样说的,也许它们都是从司马光那里承继而来。很明显,司马光的叙述一方面取诸正史,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淮南的说法。他只是取诸两端,但从未扩展文意。孰料到了鄂卢梭手里,突然扩展文意,衍绎为五路大军进发之说。而自鄂卢梭之后,治岭南史地、百越民族史者,竟然不加辨别,继为成说。本人深觉怪异,在此特为拈出,以就教于明事理者。虚构故事的讲述有越来越复杂曲折的倾向,岂料在历史领域也是如此,不过这是不足取法的。

四

《淮南子·人间训》那段话,讲完“分五军”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如果把淮南子的话理解成秦征南越的过程,自然就陷入替它填补漏洞的境地。因为“处番禺之都”意味着征伐大事底定,既然大事底定,又如何“三年不解甲弛弩”呢?于是只好把这个战况激烈的地方移到别处,并衍生出战争分两个阶段的说法。鄂卢梭将战地“移”到西瓯族人居住的地区,而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战地“移”到粤北。两相并列排比出来,颇有意思。《秦代初平南越考》:

秦军开始胜利以后,好像停顿了一年。我想此三年是221至219年,屠睢等必以为粮道不通,进取不易,所以三年不解甲弛弩,开凿兴安渠。渠开以后,攻击西瓯的战争于是开始。起初打了一次胜仗,将西瓯君译吁宋杀了,嗣后秦军孤处其地^{[3]46}。

繁体字本《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二路军由尉任嚣率领。由豫章南康之道南进,与由尉屠睢所率领之第三路军由长沙宜章之道南进,连系进入粤北之地。尉屠睢初期进攻,甚为顺利。杀其酋长,直向南进。但番禺越族较为顽强,其酋长虽死,越族人退入山岭丛薄中,并推举凶悍酋长继续抵抗。时尉屠睢军约进至今乐昌曲江之地,越族夜袭屠睢军,屠睢战死,军即散乱。时适尉任嚣所率之第二路军由大庾岭过岭南,绕出越族之后,遂击破越族。^③

所述都是本着《淮南子·人间训》里面的话,但不断加油添醋以求圆转,越来越离奇。

由于《史记》只说到秦始皇33年即前214年发诸类人遣戍和设三郡,并未提到开凿灵渠事,而《淮南子·人间训》有戍守五地并三年不解甲之说,后世学者将这两者并接调和起来,推测秦征南越的过程,产生了两阶段说。具体考订进军和凿渠之年或有分歧,要之都是将淮南所说放在前,而太史公所说放在后。鄂卢梭首先表达出这个意思,否则他不会说秦军胜利后,“好像停顿了一年”。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将此点表达得更清楚:“秦军统帅屠睢的被杀及数十万秦军的伤亡,使秦军受到了严重打击,兼之,后勤的粮草军备接不上,所以岭南的秦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粮草缺乏的困境。于是暂停对西瓯

① 见《资治通鉴》卷七。

② 《大越史记全书》。见 <http://www.docin.com/p-52035421.html>

③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第595页。此著集体编著,为非卖品,初版于1963年(署民国五十二年,由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印)

族的攻势,改由赵佗等率领秦军采取守势。于是秦征服岭南的战争进入了秦越对峙阶段,这个阶段前后持续了三年时间。……为了改变岭南秦军的困境,完成对岭南的征服,秦始皇下令凿灵渠。”^{[1]27-28}这就是说,不论由何年开始,总之是先挥师越岭,遭遇越人顽强抵抗,才有凿渠输粮之事。渠通了,征南越事才底定,然后设三郡。莫杰《灵渠》也持此两阶段说,“向岭南进攻的秦军,却遭遇到越族首领们的顽强抵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战争打得很艰苦。负责转运粮饷的监禄‘无以转饷’,乃‘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可见史禄是在秦军‘南攻百越’的第三个年头,即经历了‘三年不解甲弛弩’才动员兵士开凿灵渠的。”^{[5]47}

上述所引的见解如果符合事实,则秦征南越的战略就是一团糟糕,战将无能,战略错误。挥师进军之前居然没有想到粮草运输问题,居然不熟悉岭南水文地理状况,对越人风土习俗也未能充分了解。秦人只是一味贪得无厌,穷兵黩武。应该说,《淮南子·人间训》所描绘的此种秦人形象是符合编撰者在当日社会氛围下对秦人的猜测和理解的,但是否符合事实,则颇值得怀疑。后世的治史者对淮南子的这段话情有独钟,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对于正史的扼要和简略,其偏重军国大事而缺乏细节,而淮南子的叙述富有细节,地点详明,尤其是讲到凿渠通粮道的原因,呈现出征越过程的丰富曲折。这些都是对千载以下而又嫌文献不足的治史者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此众史家将淮南子的讲述摆在首要位置而正史的说法只是个补充,甚至与正史说法相抵牾之处也置之不顾,舍正史而取淮南。由此而衍生出五路大军攻打南越、南征分两个阶段等等说法。鄙见以为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正史与其他文献资料关系的问题。究明秦征南越的过程,并非多细节的淮南就比简略的正史更为可取而应放在首位。正史与淮南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正史严谨而淮南夸夸其谈。况且已有事实证明淮南所言只是虚语,如“结余干之水”将闽越事与征南越混为一谈,后人应该更加谨慎看待淮南的说法。吕思勉就据正史驳正淮南:“(《史记》——引者注)略地遣戍,同在同一年,即适筑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之辞,盖亦其类。徐广不察(指《集解》引徐广用淮南说,谓五十万人守五岭。——引者注),率尔援据;且缪以淮南所言发卒之数为《史记》所云谪戍之数,亦疏矣。”^{[6]677}当然并非正史就一定正确,但就秦征南越而言,正史所说,确要优于淮南所述。后来人面对文献,原则就是择善而从。淮南相比正史,只能处在补充的位置而不能凌驾其上。后世史家述秦征南越,越讲越离谱,偏信淮南而置正史说法于不顾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诸正史记载、工程遗址(灵渠、严关、秦城)和考古发掘(罗泊湾汉墓、南越王墓),秦人征南越,布局严密,准备充分,更兼军力非百越人可比。其征南越,志在必得,而且一举底定。从军事征服开疆拓土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完美的出征。由于记载稀少,加上西汉反思秦暴的氛围,淮南一类方家不实之言腾器其上,鱼目混珠。千载以下,诸说混淆,秦人当日的艰辛和远见高明,反倒模糊不清。此处特为辨证以就教于识者。

参考文献:

- [1] 张荣芳,黄森章. 南越国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 [2]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3] 鄂卢梭. 秦代初平南越考[M]. 冯承钧,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4] 胡守为. 岭南古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5] 莫杰. 灵渠[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 [6] 吕思勉. 秦营南方上[C]//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校对 龙四清)